

ZHOU EN LAI

DE

G



# 周恩来的故事

金齐人 启平 编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故事  
laoyibeiwuchangjiemingjia de gushi

2

# 周恩来的故事

金齐人 启平 编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责编：周 红

复审：蒙莉莉

终审：崔元和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故事(二)

## 周恩来的故事

金齐人 启平 编著

出版发行：山西人民出版社(太原市并州北路 69 号)

印 刷：山西晋财印刷厂

开 本：787×1092 1/32

印 张：3.625

字 数：72 千字

版 别：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8 月太原第 2 次印刷

印 数：3501 册—13500 册

书 号：ISBN7—203—03773—8/D·926

定 价：5.00 元

# 目 录

|               |      |
|---------------|------|
| 三位母亲.....     | (1)  |
| 旅欧建党.....     | (5)  |
| 领导上海工人起义..... | (12) |
| 八一军旗迎风飘扬..... | (20) |
| 战斗在敌人心脏.....  | (34) |
| 一语定干钧.....    | (41) |
|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 (49) |
| 深入农村调查研究..... | (57) |
| 粮食总指挥.....    | (63) |
| 相交贵相知.....    | (69) |
| 化干戈为玉帛.....   | (83) |
| 办公室的故事.....   | (91) |
| 蜡炬成灰泪始干.....  | (99) |

## 三位母亲

1898年3月5日，苏北淮安县的--所宅院中异常地忙碌，一个产妇痛苦的呼喊被婴儿坠地的洪亮啼哭声打断了。这个新生的婴儿就是周恩来。

周恩来有三位母亲：生母、养母和乳母。这三位母亲对周恩来的成长都有着很深的影响。

生母万冬儿精明能干、处世练达。周恩来后来回忆说：“我的生母慈祥、温柔，但文化不高，因为万家认为女人家不应该受教育。可是我从她身上学到了善良和宽容大度的品德。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如果说周恩来的养母承担了个人的不幸（丧夫）的话，他的生母则不但承担了个人的不幸（丧夫），还承担了整个家庭的不幸。当时的周家一无田产，二无积蓄，周恩来的父辈虽有兄弟4人，但伯父、生父远离家乡在外谋生，除了自己的开销，简直没有力量再资助家里；三叔从小就瘫痪残废，不能劳动；养父又病死了。这个家庭只得靠生母支撑着。周家虽穷，也是有地位人家，婚丧嫁娶，逢年过节，迎来送往，求人托事，这些都要办得井井有条，体体面面。生母万氏从小就跟外祖父出入于官府大户，见过大场面，只有她有能力担此重

任。生母处理这些应酬事项时，总把周恩来带在身边。周恩来很敬佩生母的办事能力，随着年龄的增大，他自己也知道了不少这类事情。

但是，他不喜欢生母讲排场、要面子，有时不禁问：“为什么穷成这样，还死要面子呢？”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生母这样做情非自愿，实出无奈。

养母，也是周恩来的四婶，姓陈，新婚燕尔丈夫就因肺结核辞世。为继承子嗣，周恩来被过继给陈氏。陈氏父亲是清朝秀才，陈氏自幼喜欢书画，熟读诗文，很有才学。她是周恩来的启蒙老师。

从4岁起，周恩来就每天跟陈氏读书、写字。5岁以后，又跟陈氏学儿歌和简单的唐诗宋词。那时虽说他还不能完全理解这些诗词的涵义，但已经能够背诵了。

有一次，弟弟恩溥玩刀子，差点伤了周恩来的眼睛，这使陈氏十分后怕。她必须按自己的方式将养子抚养成人，可不能有意外呀！从这以后，她干脆把周恩来整天关在自己的房间里，教他黎明就起来读书识字，等他感到厌倦时，就给他讲《窦娥冤》、《西厢记》和太平天国、义和团的传说，讲得最多的是南宋女英雄梁红玉的故事。

周恩来在陈氏的膝下度过了童年。在陈氏去世前，母子俩几乎一天也没有分开过。这段时间，正是周恩来人生的初始阶段，养母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对周恩来性格的形成、教养的提高影响极大。他对养母的亲情甚至超过生母，叫陈氏为“娘”，而称生母为“干妈”。养母死后，他专门写过一篇《念娘文》。他后来满怀深情地说：“直到今天，我还得感谢母亲的启发。没有她的爱护，我不会走上好学

的道路。”“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承继过来的。”这里说的“母亲”“嗣母”，都是指养母陈氏。

陈氏把生活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周恩来身上，为了照顾好周恩来，她请了一位乳母蒋江氏，共同养育这个被外祖父认定“有出息”的孩子。

比起养母来，乳母蒋江氏即蒋妈妈是个“粗人”，但她讲的话周恩来十分喜欢听。她将周围的农事——告诉周恩来，让他的好奇心得到满足。比如，从播种到春大米要经过多少道工序，瓜是怎么用瓜籽种出来的，为什么有的人不走路，总是让人用黄包车拉着走等。

蒋妈妈讲的话，周恩来不但认真地听，有时还学着做。就说种瓜吧，他曾在花坛里埋了一粒瓜子，天天浇水。过了好些天了，还未长出苗来，他便去问蒋妈妈为何不出苗。蒋妈妈笑了一笑说：“傻孩子，现在是冬天，要春天种才行呀。”第二年春天来临时，蒋妈妈带他在原地种了几粒南瓜籽，果然出苗了，后来还结出了几个大南瓜。周恩来高兴极了，觉得蒋妈妈真有本事，好像掌握了世界上所有的秘密。

周恩来对蒋妈妈的感情也是十分深的。童年时，他常到大运河边蒋妈妈家玩。后来在一个姓龚的人家读书时，一天傍晚，风雨交加，蒋妈妈打着伞去接他，要背他走。他却扶着她说：“妈妈，我搀着你走，路滑！”再后来，他去天津读书，蒋妈妈不顾行路艰难跑去看望他。周恩来高兴极了，陪她四处走走看看。在她要回家时，还送她一个搪瓷碗，祝她努力加餐，保重身体。后来周恩来回忆说：“我的

妈妈把我带到大运河她自己的家里，我从那里了解到劳动人民是如何生活的。”这里说的“妈妈”，就是乳母蒋江氏。

三位母亲，给了童年的周恩来三种不同的养分。他后来文思如涌，文采飞扬，这中间有养母的影响；他后来不搞特殊，紧紧和劳动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这中间有乳母的功劳；他后来成为舌战群儒的外交家，日理万机的共和国总理，深受全国人民爱戴的“大管家”，这中间有生母的熏陶。和三位母亲共同生活的经历，成了周恩来一生中的宝贵财富。

1945年的一天，周恩来在重庆对记者说：“38年了，我没有回过家，母亲墓前想来已白杨萧萧，而我却痛悔着亲恩未报！”可见他与三位母亲的亲情

# 旅欧建党

1920年11月7日,周恩来与觉悟社社员郭隆真、张若名等497名青年学生、从上海乘法国邮船,前往法国勤工俭学。

1920年,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活动下,国内陆续建立了共产主义组织,并慢慢向海外渗透。

1920年夏,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赵世炎到达巴黎。

1920年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陈公培自抄一份党纲,来到法国。

1920年12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张申府来到里昂。

张申府赴法时,陈独秀曾委派他在欧洲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1921年春,他先发展觉悟社女社员、一同与他赴法的刘清扬入党,接着与刘清扬一同介绍周恩来入党。

1921年3月,赵世炎、陈公培先后通过陈独秀的关系同张申府建立联系。于是,成立了中国人在欧洲的第一个共产主义组织——旅法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是:赵世炎、张申府、周恩来、刘清扬、陈公培。

1922年元旦前后,由赵世炎、周恩来发起,部分旅欧勤工俭学学生团体的代表在巴黎聚会,共商组织旅欧青年中的共产主义组织一事。经过充分讨论,作出如下分工:赵世炎、李维汉等在法国,周恩来在柏林,刘伯坚等在比利时,分别建立和发展基层组织。

同年3月初,周恩来坐火车去柏林,住在柏林郊区瓦尔姆村皇家林荫路54号。当时德国物价便宜,生活比较容易。周恩来便把全部精力用于在中国学生中建立共产主义基层组织一事上。他和张申府、刘清扬夫妇以及原在柏林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张伯简等四人组成旅德中国共产党组织,开展活动。

在德国,周恩来收到觉悟社社员湛小岑、李毅韬寄来的信,高兴至极。他在回信中叙述了到欧洲一年多来确定共产主义信仰的经过:“以前对所谓‘谈主义’,我便心跳,那是我方到欧洲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时的心理,而现在我已有坚决的信心了。我认清共产主义确实比你们晚,一来因为天性富于调和性,二来我求真的心又极盛,所以直迟至去年的秋后才定妥了我的目标。”

柏林的3月是美丽的时节,然而周恩来得到了噩耗:觉悟社社友黄爱在长沙领导纱厂工人罢工时英勇牺牲了。周恩来陷入深深的悲愤之中,写成《生别死离》诗一首,悼念亡友。在写给觉悟社社员李锡锦、郑季清的信中,他坚定地说:“我对他(黄爱)唯一的纪念,便是上边表示我的心志的那首诗和最近对于共产主义坚定的倾向。”并强调说:“我认定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

4月下旬，周恩来和张申府、刘清扬等写信给在法国的赵世炎，商议在五一劳动节成立统一的旅欧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问题。赵世炎回信说，因居留法国的证件在占领里昂大学事件中被没收，他不能按时返回巴黎，5月晚些时候才能领到新的居留证，况且法国的筹备工作也未妥当，所以建立组织一事还是挪到6月为宜。

1922年6月，旅欧共产主义青年组织在巴黎西郊秀丽的布伦森林成立了。代表旅德青年的周恩来，代表旅法勤工俭学学生的赵世炎、李维汉、王若飞、萧朴生、萧子，来自比利时的刘伯坚等18人，在林中的一块空地上开了三天会。

会场没作什么布置。在林中空地上有一位主持露天咖啡茶座的法国老太太，她租给每人一把椅子。

周恩来穿的是一件米黄色春秋大衣。他对会址的选择和会场不用任何装饰感到很满意，对赵世炎说：“这样布置很好，有人来了，我们不说话，谁也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

会议由赵世炎主持。他报告了会议的筹备经过和重要意义。周恩来报告了由自己起草的组织章程。

在讨论组织章程时，周恩来提议新成员加入组织应当宣誓。有的代表反对，说这带有宗教色彩。周恩来解释说：“我们宣誓不是宗教信仰，而是带有政治约束的。如袁世凯曾宣誓忠于民国，但他以后做了皇帝，人民就说他叛誓而讨伐他。”

关于即将成立的组织的名称，周恩来提议叫共产主义青年团，大会最后采纳了多数人的主张，定名为旅欧中

国少年共产党。

会议经过三天讨论,选出了中央执行委员会,赵世炎任书记(代号乐生),李维汉任组织委员(代号罗迈)、周恩来任宣传委员(代号伍豪)。此外,还决定出版机关刊物《少年》。委员会的办公地点定在巴黎赵世炎住的小旅馆里。

大会结束后,周恩来回到柏林。

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后,周恩来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

一方面是宣传工作。1922年8月1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少年》创刊(一年半后改名《赤光》),作为该组织的宣传委员,周恩来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共产主义与中国》等一系列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文章,因论理透彻、笔锋犀利,受到勤工俭学学生们的欢迎。

周恩来做的另一方面工作,是发展新党员。他回到柏林后不久,就和张申府等人一道,将从国内来的高语罕、郑太朴、萧林生、章伯钧等人吸收到党内来了。

朱德也是在那个时候入党的。

1922年10月22日,两位军人模样的中年人来到柏林,不顾长途旅行的疲劳,直奔周恩来的住所。

周恩来开门,将两位远道而来的同胞热情地引进房内,给他们搬来椅子,敬上热茶,问:“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助吗?”

来人很客气地站起来,其中一位自我介绍说:“我叫朱德,字玉阶,四川仪陇人,是来找共产党的。”说

完，又指指另一个人说：“他叫孙炳文，四川南溪人，我的老朋友。”

从年龄上说，周恩来小朱德 12 岁，小孙炳文 14 岁，只是个小弟弟。但是，一听朱德说是来找共产党的，周恩来既感到高兴，又不得不严格按纪律办事。他拿来笔记本，请朱德讲述自己的经历。

朱德陷入了沉思。

他的经历是复杂的。他早年曾加入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曾在军阀部队中担任过团长、旅长等高级军官职务。但是，五四运动促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决心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开始新的生活。他会见过孙中山，也曾找过陈独秀。他对陈独秀说：“我愿加入共产党。”陈独秀没有答应他的要求。朱德并未失望，和好友孙炳文到了巴黎，住在一个商人家里。听说有一批中国留学生 6 月份刚刚成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后，连忙打听，经过一番曲折，终于找到了周恩来。

周恩来边听边记，深为朱德寻找党组织的精神所感动，并留他们一起吃饭。

他们一起交谈了六天六晚，周恩来对朱德有了全面了解，同意他的入党申请。在国内正式批准之前，让他和孙炳文作为柏林党组织的候补党员，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11 月，经周恩来、张申府介绍，中共中央正式批准朱德、孙炳文加入中国共产党。周恩来将此郑重告诉朱德，并嘱咐他要严格保密，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

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党员发展工作进展顺利，党员人数不断增加。

1923年2月17日至20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西郊一个小镇的礼堂举行临时代表大会，决定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改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因赵世炎等同志即将赴苏联学习，大会一致选举周恩来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执行委员会书记，任卓宣、尹宽、汪泽楷、萧朴生为执行委员，刘伯坚、王凌汉、袁子贞为候补委员。

不久，周恩来向团中央汇报了2月会议的经过。报告中坚定地说：“我们现在已正式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旅欧团员了，我们已立在共产主义的统一旗帜之下，我们是何其荣幸！你们希望我们‘为本团勇敢忠实的战士’，我们谨代表旅欧全体团员回答：‘我们愿努力毋违！’”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进行合作，全体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建立各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

周恩来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对建立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的认识较早。6月16日，中共“三大”正在进行之中，在欧洲的周恩来早已和其他两位同志到里昂与王京歧开始了国共两党合作的商谈。

王京歧曾是勤工俭学学生，参加过占领里昂大学的斗争，后被遣送回国。1922年8月，孙中山派他到法国筹组国民党旅欧支部。周恩来找上门，他很高兴。

经过长时间的交换意见，双方终于达成协议：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即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的团员全部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周恩来还为实施国共合作提出了很好的建议，积极筹组国民党巴黎区分部（即巴黎通讯处）。

1923年1月25日，国民党旅欧支部在法国里昂举行成立大会。会议选举王京歧为执行部部长，周恩来为执行部所属总务科主任。王京歧回国述职期间，由周恩来代理执行部部长，主持国民党旅欧支部的工作。

1924年，在国共两党的真诚合作下，中国国内国民革命的局面为之一新，形势发展很快，急需大批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优秀人才。周恩来在欧洲卓有成效的工作，引起了党的注意。1924年夏，党中央发电报调他回国工作。

1924年7月下旬，周恩来提着行李箱，从马赛登上轮船，踏上返回祖国的航程。

## 领导上海工人起义

1926年秋冬之际，北伐军攻克了武汉、南昌，势如破竹。为响应北伐军，上海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接连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第一次、第二次起义都失败了。年底，中央军委委员周恩来秘密到达上海。他立即同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组织部长赵世炎取得了联系。

1927年2月23日晚，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了特别委员会，由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尹宽、彭述之、周恩来、肖子璋组成。同时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特别军委。不久，周恩来即被推上了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总指挥的重要岗位。

当时，北伐军已胜利地控制了江西、浙江两省和安徽大部分地区，前锋从南、西两面逼近江苏南部，原来盘踞苏、浙、皖、赣、闽五省的军阀孙传芳，经过北伐军沉重打击后，已是苟延残喘，不得不投靠统治着东北和华北的奉系军阀张作霖。

2月底，张作霖派鲁军毕庶澄部3000余人南下上海，接替孙传芳系统的李宝章部，负责上海防务。当时上海地方警察只有2000人，兵力不强，周恩来感到这正是发动武装起义的有利条件。

为了卓有成效地领导第三次武装起义，周恩来认真总结了前两次武装起义失败的教训，对第一次武装起义做了极为周密的准备。

周恩来从工人中选调当过兵、有过实际作战经验的党员做教员，在闸北定兴路一座石库门房子中举办军事训练班，训练武装起义的骨干。在武器准备方面，因经费所限，除向外国洋行购买一部分手枪和弹药外，主要靠从敌人手里取得的武器武装自己。

鉴于局势动荡，一些中小资本家的商会等机构纷纷收罗人马，组织“保卫团”，以保护他们生命财产的安全。

一次，周恩来问商务印书馆的工人：“我们是不是要参加保卫团？”

工人们不解地说：“我们参加保卫团？难道要我们去保卫资本家？”

周恩来笑了笑问：“我们手里缺什么？”

“缺枪。”工人们不假思索地说。

周恩来说：“这不得了，保卫团有枪。我们参加保卫团就是为了把枪掌握在我们手里。”

工人们明白了。

商务印书馆有20多名工人参加了保卫团。保卫团发给每个团员1支枪、1套制服、30发子弹，平时可以把枪放在家里，到执行任务时再带枪出发。这批枪，在第三次武装起义爆发后起了很大的作用。

起义前夕，周恩来夜以继日地工作，经常奔走于上海区委和上海总工会等处，指导起义的准备工作。在他的领导下，闸北、南市、沪东、沪西等区分别制订出包括进攻的